

CAMBRIDGE

社会学译丛  
理论前沿系列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

周雪光 著  
郝大海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与 生活机遇

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  
1949 - 1994

S

社会学译丛  
理论前沿系列

# 国家与生活机遇

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  
1949—1994

周雪光 著  
郝大海 等 译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 1949~1994/周雪光著；郝大海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2

(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ISBN 978-7-300-18990-1

I. ①国… II. ①周…②郝… III. ①社会阶层-研究-中国-1949~1994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479 号

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国家与生活机遇

——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 1949—1994

周雪光 著

Guojia yu Shenghuo Jiyu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2 000

定 价 6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献给昭慧和凯蒂

# 中文版序言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着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5年（1949—1994）间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状况，特别是国家政策对民众生活机遇的影响。这是由我于1993—2013年间在这个主题上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我很高兴这本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的著作有机会以母语与国内读者见面。我借用中文版序言向读者介绍一下此项研究的背景和我在英文版出版十年后对这一主题的感受。

—

这个研究课题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而来。1991年我来到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博士毕业后学术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学校鼓励年轻教师申请科研项目，特别是由高学术声誉的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资助的项目。于是，我向NSF提交了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申请报告。在向系里同事征求意见时，两位同事菲莉斯·莫恩（Phyllis

Moen) 和南希·布兰登·图玛 (Nancy Brandon Tuma) 都表示出极大兴趣, 主动提出愿意参加到这个项目中。莫恩是研究生生命历程 (life course) 的著名学者, 图玛则是事件史统计方法的重要贡献者。她们两人的加盟使得这个项目极有吸引力。我们在 1993 年进行了试调查后, 于 1994 年得到了 NSF 的资助。

我的研究生训练和博士论文主要是在组织社会学领域, 没有涉足中国研究。之所以选择中国社会分层这个题目, 一方面是我对当时学术界兴起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有着极大兴趣, 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中国社会成长经历的身心感受。记得在读博期间学习事件史统计模型时就联想到, 这一模型对于研究中国民众坎坷生活历程极有意义。但没有预料到的是, 为这个项目所收集的资料内容与信息是如此丰富和有趣, 以至于我在这个领域中耕耘历时十年, 欲罢不能, 和同事们先后写了十几篇文章, 大多在美国社会学主要刊物上发表。于是, 无意间我搁置了自己原来的学术训练, 闯进了连一门课都没有上过的社会分层领域, 奉献了自己学术生涯启程的第一个十年。

在学术旅途上, 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 因为前面总是有着引人入胜的学术问题、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当本书英文版于 2004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 我已经开始了崭新的研究计划, 从过去的量化研究风格转向以田野观察为基础的质化研究取向, 从社会分层领域转向组织社会学领域。从那时开始, 我在新的学术路途上愉悦地前行, 无暇回顾过去从事社会分层研究的这段经历。几年前当郝大海教授告知我他在组织翻译这本书时, 我还对中国读者是否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有些疑问, 唯恐辜负了大海的好意和辛苦。直到 2013 年暑假有机会通读了大海转来的中文版稿件, 这才给了我重温自己这段研究历程和重新评估这些研究工作的机会。

## 二

重读自己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使我意识到, 这一研究工作有着自己当时低估或未及领悟的意义。首先, 这一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信息极为宝贵。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近乎停滞, 虽有宏观层面的统计资料, 但

在微观、个体层面系统资料特别是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当我们在1993—1994年收集城市居民生命历程信息时，将被访人年龄限定在18岁至65岁。那些高端年龄区的被访人恰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到收集资料的1993—1994年，他们的生活已经历了40多年。世界风云际会，人生沉浮跌宕，他们的生活经历记录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微观过程。今天，随着代际更替和生命逝去，这些保存在个体层次的生命历程资料和它们所反映的历史变动过程再也难以寻觅。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完整的生命史资料，为认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分层过程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全面、丰富的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项目对于保存、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社会分层的演变过程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

其次，这本书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5年间城市居民生活机遇诸方面的历史演变资料，以及从教育、就业、换工作、晋升、入党到收入与福利等生命历程各个阶段、各环节及其相互间关联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1949—1976）和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4）的对比描述，为分析认识中国未来的社会分层趋势和内在过程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基准线（baseline）。这本书中报告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与推进近年来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过程及趋势的争论。以今天的学术眼光回顾，这些资料收集工作为我本人的学识能力所限，加上当时资料收集环境艰难，从抽样设计、问卷访谈到分析解读都有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今天，这些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文献已经极为丰富。在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结束不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也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生命史抽样调查。与我们的城市样本不同，他们的资料包括了城市和农村样本。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与已有文献中各个领域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相比，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追踪了一个全国性城市样本中城市居民在生命史上各阶段的重大事件及其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并将这些生命史事件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变迁的背景和过程中加以解读，从而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的整体性分析。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同的部分如此关联汇集而成的

整体，其意义超过了这些个体的简单相加。

最后，这项研究工作在理论解释和操作化上也力图有所创新和突破。在理论上，我提出的社会分层动态过程的模式——即国家政策和政治过程可以打断或改变传统的代际传递机制和资源——是不同于传统社会分层文献的新理论思路，并将此延伸至分析解释官僚体制中的晋升和代际流动。在与倪志伟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我提出了“政治与市场协同演化”的理论模式。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分层大趋势与我这一解释框架提出的基本立论是一致的。另外，这些研究在应用生命史统计模型时，在“同期群”构建、跨历史时期比较等操作化及分析方法上均有改进和推进，体现了我们力图将量化研究与当代中国制度安排和历史过程进行实质性结合的努力。

### 三

这项研究的资料截止到1994年，本书报告的分析发现和结论也反映了到那时为止的社会分层动态过程。对照随后20年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状况和趋势，我对本书研究发现的解读有所修正。这一对比也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一下我的新近感受。

第一，较之今天改革开放的状况来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在阶级间差距、利益分化程度等方面明显较小，这一点在本书呈现的系统资料中可以确认。但我们不应忘记，毛泽东时代“去阶层化”的状况是以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下水平、近乎停滞的社会流动为代价的。本书中细致描述的历史趋势显示，毛泽东时代社会群体间在教育、收入等方面差距明显缩小的时段正是整个社会机会结构急剧萎缩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政治过程的急剧震荡波动的确抑制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权力扩张，但同时也殃及社会诸多群体的利益和生活机遇，打断了城市民众的生命历程，其影响面积之大，冲击力之强，变化之急遽，实为历史上所罕见。这一点我在最后章节讨论中已经提出，但鉴于近年来在学术界、意识形态界的有关争论，在这里值得再次强调。而且，城乡二元化结构乃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已是不争事实。因为本书聚焦于中



国城市中的社会分层研究，对这一状况未能涉及。这一点还请读者注意。

第二，我在书中提出，由于政治过程的影响和冲击，代际流动机制和资源在中国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传递作用是有限的。20年后来看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这一观点显然是过于乐观了。据新近研究显示，当今社会阶层的固化程度、代际间资源传递力度有着急剧发展的势头。例如，教育曾经是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这一领域中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强调区分教育机会结构变化与分层机制对教育地位获得的各自作用。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教育机会很大程度上的扩大惠及各个社会群体；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层机制的作用也在强化。在宏观层次上，教育机构等级不断分化，教育资源分配和流向极不平等；在微观层次上，代际资源传递在教育地位获得和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更为彰显。这些趋势和背后的因果机制有待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仔细分析和解读。

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分层机制和过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格局。从大趋势来看，中国传统制度设施在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远未消失，而且在一些方面有着更为强化的趋势。例如，毛泽东时代工作单位的等级结构和以职业为基础的群体分化（如干部—工人）有限，而且这一群体差距在改革初期曾一度弱化。但近年来随着政府权力和地位的增强，随着大型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地位的建立，传统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内在机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而是在新时期以新的方式再生、延续下去。

第四，改革开放时代冲破了毛泽东时代各阶层的机遇和资源普遍低下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分层机制与新兴的利益、权力组合，与新的机制（如市场交易、官商结合）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群体的急剧分化和群体间边界的日益明朗化，并体现在代际流动机制的强化，以及在性别、年龄、族群、职业、工作组织和居住物理空间等维度上的社会隔离趋势。这些“范畴基础上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正在重新塑造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新格局。

怎样认识、解读这些历史趋势，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和之后30余年的巨大对比？也许中国大历史脉络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这一历史进程背后机制

的端倪。许多史学研究注意到，在一个新的王朝（如西汉、明代）建立之际，其对旧势力的清除荡涤为新势力特别是布衣平民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巨大机会。但随着权力巩固，新的利益集团稳定存在，社会结构固化，流动机会减少，阶层间边界随之高垒，社会流动愈加缓慢艰难。依此观之，毛泽东时代的向上流动趋势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的第一阶段，而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我希望这本书的研究工作可以有助于读者思考、探究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演变的宏大过程，也希望中国正经历的社会转型可以跳出这一历史窠臼。

这本书和这个研究项目是我与多位学术同仁合作的结果，他们的贡献体现在我们合著的文章中。资料收集工作也得益于国内几个学术机构同仁朋友的组织参与，以及（当时的）许多学生的辛苦劳动。我在英文版序言中已有感谢之言，不再赘述。在这里，特别感谢郝大海教授组织翻译本书，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学生们认真辛苦的翻译工作，这本书会失去与许多中国读者相遇交流的机会。对此，我深存感激。

周雪光

2014年3月13日于斯坦福

# 序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1994年期间，国家及其政策对普通公民产生了重大影响，个人生活机遇与轨迹也被政治起伏波动所塑造和再塑造。国家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怎样影响了个人机遇轨迹，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在本书枯燥的数据、统计和学术用语背后，我想要讲述的是成千上万真实个人的故事，他们所经历的政治环境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5年历史中重大而且反复无常的变动。我的学术训练教导我秉承抽象的理论论证、严谨的统计分析和系统的经验证据呈现。遗憾的是，这一学术取向通常要以隐去活生生的个人和生活为代价。我在进行本书的各项研究时，脑海中经常显现出不同的影像。这些影像源自我个人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对许多熟悉的他人的经历的回忆。正是这些真实的人生故事构成了本书所报告的统计发现。

我想与读者分享其中的一些故事，以此作为本研究背景的引言。让我从20世纪80年代遇到的一位中国学术长者开始。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北京一所

大学的一位颇有才华的学生。在百花齐放时期，他响应政府号召批评所在大学官员的不端行为。世事莫测，出于无人知晓的理由，他被投入监狱——一关就是二十多年。他的妻子告诉我，他由于长期坐牢，直到今天，无论床多大，他都只睡在床的一边，而且只在原处翻身。

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同学六岁就随家人一起去了一个偏远地区的劳改农场，因为他父亲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清洗，全家一并被遣送到了那里。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那场经济灾难，对于这个劳改农场特别残酷无情，许多人活活饿死。他回忆到自己作为一个孩子眼中所看到的景象：劳改犯们抬着尸体去掩埋，连他们的腿也因为饥饿而左右摇晃，难以站稳。几年后，当他离开那里时，这个曾有几百人的农场只剩下了几十人。

我的妻子昭慧曾告诉我她自己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还是个小女孩，她的母亲因为“剥削阶级”家庭背景而时常被红卫兵揪到会场挨批斗。昭慧经常在夜里很晚时，独自一人来到街角，等妈妈回家。她低声地说道：“好多次，我都觉得我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文革”初期，我也曾在公众场合看到写有父亲名字的大字报，揭发他的“剥削阶级”背景。我当时所感受到的屈辱和绝望，至今记忆犹新。记得那天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天都昏黄欲塌，竭力躲避着路上的每一个人。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当我最初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女儿也是这样的年龄。看着她那天真无邪的眼睛，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意识到那场政治动荡是多么迅速地催熟了一代年轻人！

这些故事绝非我为了打动人心特意找来的一些极端事例。在中国那个政治动荡年代生活过的人，任何一位都能讲述很多类似甚至更为跌宕起伏的经历。这些经历是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透过本书中的社会分层模式，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中许多异常、通常是彼此矛盾的景象。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45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生活标准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平等上也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与此同时，这一历史进程也见证了人们职业轨迹的上升与下降、机会的失去与复得、家庭的离散与团圆，以及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清洗与平反。在本书中，我致力于描述、分析

和解释这些复杂多面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状况以及它们对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在本书报告的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同事和朋友们的诸多帮助。我尤其要感谢菲利斯·莫恩和南希·布兰登·图玛，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这一研究项目中与我合作，并且是本书中改编的几篇已发表论文的共同撰稿人。我从南希那里学习了统计方法，从菲利斯那里学习了生命历程研究，她们在本书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她们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这一研究项目。在多年的合作中，她们一直在教导我，帮助我的专业发展，并推动我清醒地思考本书所探索的理论和分析议题。我对她们的不倦教诲深怀感激。

我要感谢侯立仁、卢林、奥尔加·苏霍姆利诺娃 (Olga Suhomlinova) 和赵伟。作为我的研究助理、朋友、合作伙伴和同事，他们不仅给予我宝贵的研究支持，而且还有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珍贵情谊。我要感谢边燕杰、罗纳德·布雷格尔 (Ronald Breiger)、克劳迪娅·布克曼 (Claudia Buchmann)、戴比·戴维斯 (Debbie Davis)、汤姆·迪普雷特 (Tom DiPrete)、肯·兰德 (Ken Land)、林南、倪志伟 (Victor Nee)、安吉·奥兰德 (Angie O'Rand)、比尔·帕里什 (Bill Parish)、肯·斯潘纳 (Ken Spenner)、戴维·斯塔克 (David Stark)、魏昂德、王丰、怀默霆 (Marty Whyte)、约翰·威尔逊 (John Wilson) 和谢宇，他们多年来的意见和帮助改进了我的工作。还要特别感谢戴维·格鲁斯基 (David Grusky)，正是他最初的鼓励促成了我写作本书的决心。尽管本书关注的是中国研究，但我的学识却是以师从詹姆斯·马奇 (Jim March)、约翰·迈耶 (John Meyer)、理查德·斯科特 (Dick Scott) 和布兹·泽尔迪奇 (Buzz Zelditch) 的多年学习为基础的。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阿莉娅斯·温特 (Alias Winters) 女士，她的指导和帮助使得本书的出版过程十分愉快！

这个研究项目起步于我在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我随后任职的杜克大学及其社会学系在这些年来为我提供了慷慨的支持。这个研究项目始于一项探索式研究，为此我于1993年在北京和上海收集数据。这一探索式研究是由美国社会学学会/国家科学基金 (ASA/NSF) 学科发展支持基金、拉姆 (Lam) 基金和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项目的哈尔彭 (Halpern)

基金所资助的。这个研究项目主要的的数据是1994年6月至12月间收集而成，由NSF（SBR—9413540）拨款资助，并由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完成的。我要感谢范伟达、李强、潘允康、彭希哲和王辉，以及以上这些机构中的许多学生和研究人员，他们为收集数据提供了慷慨帮助。美国国家教育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的斯宾塞基金（Spencer Fellowship）使我能从杜克大学请假去实地组织调查。我感谢这些资助机构对这个研究项目的支持。依惯例，它们对本书的分析和发表的观点是免责的。

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在我的祖国经历磨难的那些岁月里，大部分书籍被禁。他们细心地呵护和培育了一颗年幼、好奇的心灵。没有他们的鼓励 and 爱护，我的求学生涯或许在高中后就终结了。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妻子薛昭慧和女儿凯蒂。她们默默地支持着我和我的工作，容忍着我的熬夜、无序的作息，以及因研究奔波而在她们生日和假期时的缺席。谨将此书献给她们。

## 对转载授权的致谢

我对几家出版机构允许使用其出版物中相关材料的版权许可表示感谢：

第 11 章表 11—2 部分内容转载自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dited by Anthony Barnes Atkinson and John Micklewright. © 1992,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授权, 第 81 页表 4—1。

第 11 章表 11—2 部分内容转载自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fare*, edited by Peter Gottschalk, Bjorn A. Gustafsson, and Edward E. Palmer. © 1997,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授权, 第 39 页表 3—1。

第 11 章表 11—2 部分内容转载自中国的 *Retreat from Equality*, edited by Carl Riskin, Zhao Renwei, and Li Shi. © 2001, M. E. 夏普出版公司 (M. E. Sharpe, Inc) 授权, 第 28 页表 2—1 和表 2—2。

第 1 章开始对舒尔曼 (Franz Schurmann) 的引用

转载自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y Franz Schurmann. © 1968,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授权, 第 xxxvi 页。

第 1 章开始对泽林尼 (Ivan Szelenyi) 的引用转载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6, Ivan Szelenyi,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 1978, 布里尔学术出版商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授权, 第 1 页。

第 5 章开始对韦伯 (Max Weber) 的引用转载自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 1968,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授权, 第 975 页。

xxiv 我还要对下列几家出版商和学术协会对于本书下列部分中的转载或改写内容的版权许可表示感谢:

美国社会学协会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Xueguang Zhou and Liren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2 - 36.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Xueguang Zhou, Nancy B. Tuma, and Phyllis Moen.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49—1993.” *Social Forces* 74: 759 - 96.

塞奇出版公司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 Xueguang Zhou. “Political Dynamics and Bureaucratic Career Patter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9): 1036 - 62.

学术出版社 (Academic Press), 2001. Xueguang Zhou and Phyllis Moen. “Explaining Life Chance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Life Course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0 (4): 552 - 77.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135 - 7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我改写这些已出版的作品并纳入本书时，使用更新的数据和统计模型重新进行了分析，大多数图表也因此更新了。另外，第3章和第9章也是基于已发表的作品，但在本书中已被重新修订改写了。